

# 西部乡土的现代性困境书写及出路

## ——从雪漠《白虎关》谈起

□ 曹雨瑞

**[摘要]**当下，许多西部作家的创作摆脱“苦难化、雄性化”的固有特征，直面西部的现实生活，书写西部地区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雪漠的《白虎关》深刻书写了西部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相较于中东部地区所面临的差异性问题：碎片化的现代性受到强大的传统秩序压制，后发展焦虑与发展路径的艰难，直观且深刻的生态困境。但这些迥异的现代性困境也为西部文学带来了独特的书写资源。

**[关键词]**西部文学 现代性 雪漠 《白虎关》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 (2025) 23-0074-04

### 一、传统秩序压抑与乡土伦理救赎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无法规避的问题：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变迁，传统人文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技术理性”的伴生性破坏，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观察到西方国家所面临的现代性局限。实际上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现代性并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的社会思维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而言，现代性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碎片的、萌芽的形态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大部分地区的运行秩序仍然呈现出“经验代替理性”“人情代替法治和契约”的情况，主导中国社会的仍旧是传统社会中的血缘秩序<sup>[1]</sup>。而西部乡土地区作为相对发展落后的区域，现代化进程更滞后，传统社会秩序也更顽固，个体的现代意识的碎片性、朦胧性更加显著。因此，与其说西部乡土文学展现了西部人民所经历的现代化弊端的精神困扰，不如说呈现了西部人民在碎片化的现代性与强大传统秩序的矛盾对抗中产生的焦虑情绪，并且因强大的传统秩序顽强地战胜了“不在场”的现代性而感到无所适从。

现代性的精神维度之一是个体的主体性与自

我意识。但在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大部分个体都是用经验、习俗、惯例自发地生存，这种经验、习俗、惯例在西部地区具体化为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宗法关系和落后陋习。到了21世纪，《白虎关》中的兰兰、莹儿的母亲仍是典型的按照经验、惯例生存的“前现代社会”人。作为家暴的受害者，她们从来没有觉得被男人打是一件需要反抗的事情。在沙湾，女人被男人像“被褥一样折”是家常便饭，这些母亲已经被强制性地熬成了做饭机器、生育机器、干活机器，这是她们共同的生活轨迹。但她们的女儿们却已有了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萌芽，如兰兰和莹儿都试图对落后的换亲传统进行抗争。但强大的传统社会秩序的化身——宗法关系阻碍了兰兰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将莹儿推向了绝望的死亡。在这样一种“不在场”的现代性和主导性的传统秩序的对抗中，启蒙对于年轻人，特别是对于年轻女性而言犹如令人清醒的一剂“毒药”，她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但她们用尽全身力气仍然无法与强大的传统社会秩序作斗争。

猛子与父亲老顺在世界观上的不同，实则是

**作者简介：**曹雨瑞，四川师范大学。

前现代社会的精神特征与现代性个体主体性的对照。老顺面对人生中的一切磨难，总会说“老天给的，我就受着”，这样的受难思想一直影响着猛子，猛子每次遭遇挫折时都会用父亲这句话安慰自己，猛子还曾引用西西弗斯的神话来形容个体在绝对性的超自然力量面前的无力感。但深究文本，可以发现猛子这样的受难思想实际上只是尝试失败后的自我慰藉，推动猛子每一次重要行动的是他内心掩藏不住的主体性追求。面对急剧改变的沙湾和暴富的双福，猛子曾无数次感叹，以前懵懂的时候糊里糊涂，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而此时的猛子已经经历了大哥憨头的死亡，憨头的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一个农村家庭的穷病。猛子面对贫富分化的沙湾，开始产生典型的现代性焦虑：无力、不安。他想要回到父母那一辈麻木、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却再也不可能，猛子在此时感受到的痛苦正源自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中国传统精神观念的撕扯。

“老顺眼里，白虎关搅乱了一切。村里的好多东西，随着白虎关的热闹，都消失了。”<sup>[2]</sup>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中，有的乡村正在消逝，一起消逝的还有内心的宁静、人际关系的淳朴。但在白虎关这个现代化进程较慢的地区，仍然可以发掘出许多具有美好意义的乡土伦理价值。对这些乡土伦理的再发掘，有利于消除现代化带来的人际关系隔膜等弊端。

在《白虎关》中，双福倒下之后，猛子收集民意时意外地得到了众多村民的支持，其中不乏平时在背后骂双福的人；村民们得知月儿害了梅病后，为月儿和猛子二人的感情感到惋惜，并没有如猛子所预想的那样，传出各种流言蜚语。西部人民骨子里的淳朴、豁达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精神文化特征，并不一定要在苦难化叙事、雄性风格中展现，在兰兰的身上能够看到西部的精气神，在莹儿的身上能发掘出纯粹和坚定的力量，在月儿的经历中也能重温苦难叙事中缺席已久的人性温暖和人文关怀。进入新世纪以后，城乡差

异并非西部乡土作家着力书写及解决的问题，都市文明也不是乡村所追求的理想文化形态，在碎片式现代化逐渐走入西部乡村的过程中，作家们开始回溯本土仍具有极高价值的人际伦理、文化形态等。

## 二、后发展的焦虑与主动观察

“西部大开发”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项宏观战略，开始具体而又深刻地改变沙湾中每一个人的想法。此时西部乡村的大部分人民，首先要面临的是中东部地区的先发优势，这样的优势吸引着他们走入城市，出走者往往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白虎关》中最为典型的出走者有月儿和灵官，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月儿的出走源自乡土地域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是对传统陋习压迫女性的拒绝；灵官的出走则是对自我灵魂的放逐，执着于对主体价值的打破、重塑。月儿借着“花儿”唱腔走进都市，却唱不出独属于自己的舞台，成为残败的“花儿”。但在回归乡土后，月儿仍然没有放弃“花儿”，传统民俗此时成为破除现代理性思维的工具，“民俗长期充当了寻求本真之物的一个工具，满足了逃避现代性的渴望”<sup>[3]</sup>。月儿的出走，蕴含了西部乡土作家对都市文明的天然心理距离、对现代性的严肃反思以及对传统民俗价值的温情回望，灵官的出走则寄托了对本土文化的反思。虽然已明确观察到现代性的弊端，但作家也清醒地意识到本土文化的压抑一面与对主体价值挖掘的忽视。

除此之外，西部部分乡村人民还因为缺乏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理性认识，而陷入发展焦虑。各地的沙娃和资本涌入沙湾，从前荒无人烟的沙湾现在变得寸土寸金，无数村民都因为没有把握住发展机会而懊悔。但与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较，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要求经济运行理性化，受内在的科学理性和计算原则支配。因此，即使猛子、老顺等人想要靠掘金发财，却仍以失败告终。在白虎关的淘金热中，出现了那

么多的窝子，就属双福的窝子最“红”，出的金最多，大家都说是因为双福的祖坟位置好。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效益的高低取决于一种叫“财运”的东西，这是一种先验、随机、不稳定的东西，但双福在挖出金子之后，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机器“卷扬机”，提升工作效率，把资金投向其他产业，让自己的资金流动起来，而不是固守这一亩三分地。相较之下，猛子在开窝子时只是按照常识、惯例估算位置，成为其开窝子失败的根本原因。

《白虎关》是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创作出的作品，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前，大部分西部地区都是处于前现代化状态中。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之处在于，中东部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更多地体现在城乡差异之中，表现为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与失落。而西部地区除了要面临城乡差异这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之外，还要思考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能否通过观察中东部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利用这样的“后发展优势”，对现代性的弊端加以规避。

在白虎关的淘金热中，村民们立足西部这个后发展地区的客观条件，观察其他先发展地区的经济状况，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村民们发挥了后发展的优势，看到了开发经济的优缺点，以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在淘金热的影响下，白虎关到处都是“窟窿”，沙漠化速度加快，沙湾村民对于这样的现象不是没有心理预期，他们明白经济的发展会使白虎关逐渐被机械声、喧嚣声淹没，但是在惋惜自然环境被破坏之时，村民们也在期待着，如果白虎关被开发成了城镇，那他们就会拥有真正的城镇户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现代性发展的弊端在后发展地区是不能够被完全规避的，不管对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现代性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合理的管控机制可以有效应对并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 三、生态困境下的精神韧性发扬

相较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紧密。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制约、影响着西部人民的生活，其中包括文学活动。西部作家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会对西部特有的环境情况、精神状态进行书写，这些书写深刻地折射出西部作家的美学心理与文化准则。传统农耕社会大都靠天吃饭，但是自然除了给人带来丰收、歉收之外，并没有随时在场的人地冲突。但西部相比中原更加恶劣的气候条件、地貌环境、自然灾害，使西部人民在面对自然时更加虔诚与敬畏。正是在这人与自然的双向交流中，人才能发现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完成更好的自我确认。“本初形态的西部自然为现代人的朦胧灵魂的栖息和对于生命本相的追问保留了可贵的空间，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美’生成的资源和环境。”<sup>[4]</sup>在自然“在场”中发现个体的“在场”，成为西部文学书写的独特资源，也为挖掘跨越历史、地理因素的精神解药提供出路。

在《白虎关》中，兰兰和月儿想要穿越沙漠去驮盐，在这条驮盐之路上她们二人却险些丧命。兰兰和莹儿在这片沙漠之中和豺狗进行了殊死搏斗，搏斗的结果是一匹骆驼落入豺狗的口中。莹莹、兰兰和另外一只骆驼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是也被豺狗的围猎以及沙漠的干旱荒凉折磨得心惊肉跳、形销骨立。这是人和自然的一场生死较量，直接且触目惊心。与自然搏斗的场景很少在中东部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呈现，但在西部文学作品中却比比皆是。西部文学作品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展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警告也在西部文学中成为一种寓言式的存在，希冀着人们的重视和化解。

西部文学在人与自然的深刻交往中，展示出寻找自身精神力量以抗衡现代性弊端的道路。虽然沙漠之行让兰兰、莹儿二人差点丧命，但兰兰在与豺狗搏斗的时候显示出异乎常人的冷静、沉着、智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雪漠所说的“民

族精气”。这种精气强大而又充满生命力，并且这样的精气并没有出现在男性角色的身上，而是在主要女性角色兰兰的故事中得到书写，这不仅是对以往西部文学“雄性化”特征的反拨，更是一种对“地母”博大力量浓墨重彩的书写。与其说是金刚亥母指引兰兰走出沙漠，不如说是兰兰身上的这种民族精气在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民族精气能够让人们在面对自然困境时，展现出人的主动性和超越性。大自然是一个完整、有秩序、有活力的生命体，人亦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5]</sup>生命体之间具有天然的同质性、同构性。西部文学中始终伴随着“天人合一”的书写，这既来自农耕文化的自然敬畏心，也来自长期与自然相处、互动而获得的主体感知。若想从自然中获得审美力量，必须唤醒自然对人的心灵始终在场的震颤力量。“民族精气”源于自然与人之间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连接，这种连接使作品内容实现了精神的飞跃。

西部作家们长期以来的文学实践都主要面向乡土寻根，而乡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面向自然的文学，寻根的意义在当下也超越了地理区域的限制，指向人类终极性的追求。在面向现实的书写中，西部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深入思索，蕴含着这样的启示：对现代性的探索与讨论，需要我们走向大地，从中发现超越个体存在、涵盖万物的运行规则、生理形态与文化结构，也需要走向传统，挖掘当下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的观照之镜与反思之钥。

#### 四、结语

西部文学在书写现代性困境的同时，也在积极寻觅着困境的出路，提供了独属于西部的在地经验。在当下，西部乡村已不再是落后、贫穷、愚昧的象征，摆脱以往被遮蔽的西部乡土想象，书写乡土所面临的新思索、新挑战和新困境，这既是新时期西部乡土书写的重要方向，也是寻觅

西部乡土现代性困境出路的应有之义。显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关注西部地区当下的真实生活。

#### 参考文献

- [1] 衣俊卿.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4).
- [2] 雪漠. 白虎关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2017.
- [3] 户晓辉. 现代性与民间文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4] 丁帆.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5]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责任编辑 夏 波)